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

西南大后方 诗歌创作生态研究

Ecological Research on
Poetry Creation
in the Southwest Rear Area

荀利波 著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

西南大后方 诗歌创作生态研究

Ecological Research on
Poetry Creation
in the Southwest Area



荀利波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 / 荀利波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8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5201 - 5060 - 6

I. ①西… II. ①荀… III. ①诗歌史 - 研究 - 西南地区 - 现代 IV. ①I207. 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18360 号

·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 ·
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

著 者 / 荀利波

出 版 人 / 谢寿光

组稿编辑 / 宋月华 袁卫华

责任编辑 / 刘 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6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5060 - 6

定 价 / 1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 编委会

主任委员：张瑞才

副主任委员：江 克 余炳武 戴世平 宋月华

委 员：李 春 阮凤平 陈 勇 王志勇

蒋亚兵 吴绍斌 卜金荣

主 编：张瑞才

编 辑：卢 桦 金丽霞 袁卫华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 编辑说明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是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项目。编辑出版《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是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意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示范引领作用，为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服务。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 2011 年开始立项建设，在整合研究力量和出人才、出成果方面成效显著，产生了一批有学术分量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2016 年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决定组织编辑出版《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从 2016 年开始编辑出版，拟用 5 年时间集中推出 100 本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研究成果。云南省社科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专门成立了评审委员会，遵循科学、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申报的项目进行了资格审查、初评、终评的遴选工作，按照“坚持正确导向，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前沿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意义重大；符合学术规范，学风严谨、文风朴实”的标准，遴选出一批创新团队的优秀成果，

根据“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以达到整理、总结、展示、交流，推动学术研究，促进云南社会科学学术建设与繁荣发展的目的。

编委会

2017年6月

目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战时生态生成与新诗的西南出场	032
第一节 抗战中崛起的西南大后方	032
第二节 现代文学中心的西南重构	045
第三节 现代新诗在西南大后方的出场	058
小 结	072
第二章 在战火与硝烟中的诗人	074
第一节 战火中的洗礼：诗人生存状态与诗歌态度	075
第二节 硝烟中的集结：诗歌社群与诗人组织	096
小 结	118
第三章 诗歌的接受与传播状态	120
第一节 接受群体类型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121
第二节 诗歌传播的主要途径与困境	134
小 结	160
第四章 诗歌本体的生态适应	163
第一节 朗诵诗等：“使诗歌，成为大众的东西”	165
第二节 叙事诗：“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	187

小 结	200
第五章 战时生态下新诗创作活动的变化	203
第一节 战时生态下的新诗创作活动特点	205
第二节 战时生态下新诗创作的整体变化	218
小 结	236
结束语	238
参考文献	242
后 记	259

绪 论

现代中国是一个“除旧布新的时代”^①，而身处那个时代的探索者们，“无时无刻不在兴奋与苦斗之中生活着”^②，新诗在这样的“兴奋”和“苦斗”中，既是以新形式对“诗言志”诗学理想的延续，也随着打破数千年“旧传统”的民族觉醒而诞生。倏忽百年间，新诗亲历了新文化运动中青春的热血与激情，亲历了抗日战争中敌寇的铁蹄、破败的家园、尸骨的腐臭与高亢的全民族抗战建国的呐喊，亲历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独立、自由、民主、富强、文明的新时代……一代代诗人们不停歇地“歌唱”，留下了无数宝贵的诗篇。

全面抗战时期，“共赴国难、以血涤辱”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③，是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一个重要转折期，也是新诗“千载难逢的机会”^④。不论是诗人面临的血与火的现实，还是诗歌艺术面临的新问题，都随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而经历着一场新的变革，其中又尤以战时陪都重庆为核心，辅以成都、昆明、桂林、贵阳等主要城市，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集聚的西南大后方诗歌最为独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战事的胶着，逐渐在空间上形成了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政治地理格局，而国统区核心西南大后方因特殊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地位，人与资源的集聚，不同政治立场的交锋，诗人们对抗战建国、争取民

① 谢冕：《序一：置身于文化冲撞的困惑》，载谢冕、杨匡汉主编《中国新诗萃：20世纪初叶—4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1页。

②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1935年10月），转引自谢冕、杨匡汉主编《中国新诗萃：20世纪初叶—4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1页。

③ 杨剑龙：《新诗遇到了抗战 这是千载难遇的机会——论老舍的抗战新诗创作》，《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25页。

④ 老舍：《论新诗》，《中央日报》1941年5月30日。

族自由独立与解放伟大时代到来的欢呼与随时面临着的灾难、死亡的交织，以及现代文学中心在西南的重构，整体构成了这一时期诗歌独特的创作生态——是惨淡的现实与美丽的理想的和鸣，是在炮火与硝烟中对民族新生的呼唤，是和着血与泪的民族赞歌，是对“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①的欢呼，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是新诗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诞生以来唱出的真正的“民族的诗”^②，也使西南大后方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及中华文脉的延续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在中国，文学从未在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中缺席，“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是多层次、多结构的，所以现代文学史的宏观研究要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考察各种文学现象”^③。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为新诗生长营构了独特的生态，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一段独特的现象，值得我们持续、深入且系统性地展开研究，以探寻现代新诗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史上发生、发展、演变的文学规律，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新诗的言说。

—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时，新诗刚刚走过20年除旧立新的崭新征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战救亡成为全民族面临的最为急切和最为伟大的现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打破了现代新诗“艺术”发展的正常走向。特别是随着日寇逼进、国土沦丧，国民政府经营西南作为抗战大后方和根据地，现代文学中心也迅速向以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集聚，使现代新诗发展随生态变化而发生转向。当然，这种转向并非意味着否定或断裂——西南大后方的新诗发展仍然承续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新诗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因全民族抗日斗争和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的现实而形成的独特创作生态，使得这一时期的现代新诗创作取得了新的发展。

① 穆旦：《赞美》，载穆旦《穆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52页。

② 朱自清：《真诗》，载朱自清《新诗杂话》，三联书店，1984，第88页。

③ 陈伟华：《在转型时期的文化整合中应运而生——论中国现代文学之起始》，《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

由于晚清一批改良派倡导的“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①的“诗界革命”未能彻底突破“古人之风格”而夭亡，使得弃文言而倡白话、“破旧韵”而“造新韵”^②、扬弃旧诗体制而追求“自然的音节”^③等成为迫切而必然的“革命”方式，更成为新诗与旧体诗歌、“今人”与“古人”^④相区别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但中国旧体诗歌由于“诗歌的形式之臻于完备所体现出的绝对的成熟，造成了中国文学的骄傲，同时也使它成为不可超越的规范”^⑤，所以，在新文学革命初期“造成了几乎所有的人公开的和隐蔽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对于诗的变革的警惕和抗拒”^⑥，从而可以想见新诗的倡导者们对新诗确立的合法性的阐述何等艰辛。但正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发轫时曾经说过的：“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之诗，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予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⑦

作为白话新诗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以《尝试集》开启新诗实验，并强调以生活中形成的“平常情感”^⑧“平常语言”^⑨作诗，提倡“诗的经验主义”，因为在他看来：“做梦尚且要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做底子的诗。”^⑩他特别举例说：“北京一位新诗人说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上）：诗话》，载《饮冰室合集》第十六册，中华书局，2015，第4382页。

② 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介绍约翰生樊戴克两氏之文学思想》，《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第4页。

③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星期评论》纪念号第五张，1919，第1页。

④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载《胡适文存》第一卷，黄山书社，1996，第24页。

⑤ 谢冕：《序一：置身于文化冲撞的困惑》，载谢冕、杨匡汉主编《中国新诗萃：20世纪初叶—4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1页。

⑥ 同上。

⑦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0页。

⑧ 胡适：《梦与诗》，载谢冕、杨匡汉主编《中国新诗萃：20世纪初叶——4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88页。

⑨ 同上。

⑩ 胡适：《梦与诗》，载谢冕、杨匡汉主编《中国新诗萃：20世纪初叶——4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88页。

‘棒子面一根一根的往嘴里送’，上海一位诗学家说‘昨日蚕一眠，今日蚕二眠，明日蚕三眠，蚕眠人不眠！’吃面养蚕何尝不是世间最容易的事？但没有这种经验的人，连吃面养蚕都不配说，——何况做诗。”^① 胡适 1917 年 2 月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白话诗八首》（《朋友》《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之后，沈尹默、刘半农、鲁迅（最初以唐俟笔名发表新诗）、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玄庐、郭沫若、汪静之、朱湘、应修人、朱自清、潘漠华、冰心、徐志摩、李金发、穆木天等纷纷开启了白话新诗创作的尝试。1919 年 10 月，胡适在《星期评论》（上海 1919）纪念号上发表了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新诗理论的奠基之作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为白话新诗创作和批评确立了初期的基本标准，也由此掀开了中国现代新诗“从语言的实验到形式的实验”纠缠着前行、力图打破《诗经》以降数千年累积的古典诗学传统、构建中国诗歌新的美学范式的历程。至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不仅在短短 20 年间成长起一批年轻的现代新诗诗人，而且出现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湖畔诗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新月诗派、现代诗派、中国诗歌会等诗歌社群，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郭沫若、胡风、成仿吾、王独清、穆木天、闻一多、朱自清、艾青、臧克家、蒲风、梁宗岱、施蛰存、李广田、朱光潜等在新诗理论上取得了一大批收获，推进了新诗在革命、启蒙与诗歌艺术上的相谐发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战争形势日逾严峻，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经营西南，以组织持久抗战。除政府机构、军事单位、金融机构、工厂、商号等大量迁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外，随着国民政府迁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大东书局、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等文艺组织，《抗战文艺》《七月》《新华日报》等报刊，以及大批文艺界人士，纷纷辗转会聚西南，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极端形势下，也

^① 胡适：《梦与诗》，载谢冕、杨匡汉主编《中国新诗萃：20 世纪初叶——40 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 88～89 页。

形成了西南历史上文化空前繁盛的景观。文人及文化生产资源的集聚，逐渐形成了以重庆为核心，辅之以成都、昆明、桂林、贵阳等中心城市的文化汇集地，开辟了文化事业发展的新空间，使现代新诗在多个层面取得了新的发展。

一是诗人向西南的突围与新阵营的崛起。西南大后方对于现代新诗而言，最大的、也是最为现实的意义或许是在于为在战火漫天、家园破碎后辗转流离的现代诗人们提供了一个栖息地，为中华文脉的延续、现代文学及新诗继续“革命”的征程和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虽然说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初期，全国就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呼吁和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有识之士的奔走下，“文化界救亡协会”“戏剧界救亡协会”“漫画界救亡协会”“孩子剧团”等以话剧演出、诗歌创作及其他形式的文艺活动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文艺界民族救亡运动，其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等，成为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凝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但随着战事发展，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先后沦陷之后，随着北京大学、“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七月》《新华日报》等教育、文化机构、组织向西南的内迁，西南大后方逐渐成为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资源及人口的汇聚地，数以万计的教育、文化界人士如胡风、艾青、臧克家、高兰、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何其芳、穆木天、李广田等数以百计的成名诗人，也纷纷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沦陷区迁向西南，先后来到重庆、昆明、桂林等地。一时之间，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翘楚云集西南，从而不仅确立起了西南大后方领导、组织、动员抗战的核心地位，也肩负起战时文学中心、延续中华文脉的重任。在此背景下，空前高涨的救亡热情使得新诗诗人队伍空前壮大，不仅“文协”借助《抗战文艺》《新华日报》等阵地和诗歌座谈会、诗歌晚会等活动团聚了一大批流散西南的诗人，而且在重庆复刊的《七月》《文艺阵地》《中国诗艺》及先后在重庆、昆明、桂林等地创办的《诗报》《春草》《文聚》《战歌》《诗垦地》《诗创造》等刊物，都成了凝聚诗人力量、构筑诗歌阵营的重要阵地，成长起了中国现代新诗第三个十年中最为重要，且对现代新诗发展具有重要

影响的“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等，欢呼着“以自己的鲜血来洗刷近百年来被奴役的耻辱”^①，为民族救亡、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建立起了坚强的文艺阵营。

二是个体抒情的式微与大众诗歌的勃兴。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中国新诗，在打破旧传统、倡导诗体大解放的诗歌革命中，把诗歌及其他文学作为救治中国衰危的“药”，使诗歌与其他文学一道担当起了启蒙民智、救亡图存的重任。诗歌作为一种抒情文体，“抒情主义”不只是中国现代新诗独造的诗学特征，而是三千年来中国诗歌的诗学传统。因而，现代新诗诞生后，所力图打破和重构的是文言、格律等对人的思想、精神等的束缚，与中国诗歌抒情传统之间并不存在根本背离。所以，谢冕先生也认为新诗“非常完整地继承和维护了中国的诗学的正统”^②，即便“手术刀的操作出现了‘割痕’，但是中国诗的血脉没有被割断”^③。虽然新文化运动高扬启蒙主义旗帜，一大群诗人也身体力行，试图俯身于大众之中——在30年代初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已旗帜鲜明地倡导文艺大众化运动，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在左联的领导下也把“大众歌调”作为基本方向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作为先觉醒了精英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人自我解放的倡导、个体意识的觉醒、对新诗艺术的探索等，使得新诗更趋向于对诗本身的关注，因而，作为诗歌主体的诗人个体抒情色彩显然超越于对大众的关注之上。但我们必须正视的是，诗歌革命本就是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新诗作为文学革命之一种，诞生于对中国、对中华民族危亡现实的深重忧患，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的突如其来和对文学参与民族救亡的“功利主义”的突出要求，撕裂了一部分新诗人刚开启的诗歌作为“一个精致的艺术品种”^④的序幕，诗歌创作观念从个体的抒情迅速转向服务于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伟大现实，呼吁“诗人们的

① 艾青：《艾青诗选·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7页。

② 谢冕：《前进的和建设的——中国新诗一百年（1916—2016）》，《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③ 谢冕：《前进的和建设的——中国新诗一百年（1916—2016）》，《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④ 谢冕：《论中国新诗》，《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诗篇，也必须是帮助这种神圣的战争”^①。一时之间，大众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庄严宣告：“为争取民族的自由，为保持人类的正义，我们抗战；这是以民族自卫的热血，去驱击惨无人道的恶魔；打倒了这恶魔，才能达到人类和平相处的境地。”^②在战争的逼迫下吹响全面抗战的号角后，“谁还要哼着不关痛痒的花，草，情人的诗歌的话，那不是白痴便是汉奸”^③，“文协”、中国诗人协会、《新华日报》、《七月》、《战歌》、《诗》、《诗创作》、《诗报》等纷纷宣告要“以笔为枪”、把情感“寄托在民众身上”、要“强化诗歌这武器，使它属于大众”^④。中国现代新诗真正开始从“小我”走向了“大我”，走向了“中国危急的、惨烈的、苦难的和伟大的现实，走到了大众之中，突破了现代新诗从诞生之初“以夷为师”的固有路向，民间歌谣、古典诗词、鼓词、小调、俚语、谚语等民族民间艺术的形式、语言成为滋养新诗艺术的养分，抒情短诗、朗诵诗、街头诗等“大众歌调”突起。虽然从艺术品质角度对历史的回望中，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民族抗战大时代到来的亢奋激情使得主观抒情泛滥，从而导致一些虽短小精悍但也充斥“空洞的抒情和干瘪的叫喊”^⑤的作品出现。但是，正如王瑶先生所说：“社会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由于作者处于人民革命的时代，本身有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强烈愿望，他们渴望将自己所熟悉和理解的一些社会矛盾和生活画面直接描绘出来，诉诸读者的共鸣，以推动社会的革新和进步，因此虽然许多作品今天看来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时代精神是鲜明的，所反映的生活基本上是真实的。”^⑥随着抗战的持续，现实的体验和理解不断深入，客观现实和理性思考不断融入作品，长篇叙事诗、讽刺诗、政治抒情诗等引领了诗体发展的新潮流，“使抗战时期出现了中国新诗史上诗歌深入民间的罕见的文化图景”^⑦，

① 黎嘉：《诗人，你们往哪里去？》，《新华日报》，1938年2月2日。

②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1938年4月。

③ 中国诗人协会：《中国诗人协会抗战宣言》，《中国诗坛》第1卷第4期，1937年11月。

④ 编者（华笈执笔）：《我们的告白》，《诗报》创刊号，1937年12月。

⑤ 熊辉：《试论抗战诗歌的文体流变》，《文艺争鸣》2015年第7期。

⑥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第12页。

⑦ 吕进等：《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重庆出版社，2015，第3页。

为新诗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开辟了新道路。

三是一批优秀的新诗作品将新诗发展推向新高。从新诗的诞生到进入抗战时期后，新诗不仅在诗体上因暗合社会理性和工具理性至上的社会变革需求而历经着争议和变化，而且也随诗体的变化显现出新诗“从重音到重义，从意境化到意象化和形象化，从‘隔行扫描’到‘逐行扫描’”^①的艺术探寻路径。整体而言，抗战救亡及现代诗人们所经历着的伟大的、卑小的、激昂的、悲切的现实，将辗转、“突围”后会聚西南大后方的诗人们重重地推向生活现实之中，也将现代新诗从草创以来一直苦苦探寻和建构的诗歌艺术从以个体为主的理想之维推向了民族、国家和四万万同胞的现实之维。从而使得中国新诗从诞生以来以精英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姿态开启的启蒙历程，真正地走入了中国的社会现实之中，走入了中国广大民众之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艺术与现实的融合，因此也使得一批在新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诗歌作品在全民族全面抗战的西南大后方这一独特的环境下形成。

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从《女神》的积极浪漫主义走向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创作了收入《战声集》《蝣蟥集》等集子的400多首^②反映抗战生活、歌颂“我们的抗战和我们的祖国”^③的诗篇，其中，主要以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战声集》被誉为“抗战初期诗歌创作的一个珍品”^④；艾青是抗战时期诗歌创作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在历经了抗战初期的盲目乐观情绪之后，从“复仇的欢快”中沉静下来，重新沉潜到了他所熟知的“穷困悲惨的旧中国”和“热爱与同情”的劳动人民之中，出版了《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吴满有》《旷野》《火把》《北方》《黎明的通知》《土地集》《雪里钻》等诗集十余部，其中以叙事长诗《向太阳》《火把》等最具代表性，这一时期的诗歌真正体现了艾青在“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上”^⑤嘶哑着喉咙为那“悲哀的国土”“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

① 章亚昕：《中国新诗史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第11页。

② 朱光灿：《中国现代诗歌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第181页。

③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第394页。

④ 朱光灿：《中国现代诗歌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第187页。

⑤ 艾青：《我爱这土地》，载艾青《艾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73页。

种族”^①的“歌唱”，也是显示艾青“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得以定型”^②的重要作品；臧克家同样是抗战时期诗歌创作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他从全面抗战初期开始就始终坚持“为抗战救亡宣传工作尽心尽力”^③，参加青年军官团，赴前线和敌后做战地宣传，先后完成了呼吁诗人们放开喉咙“高唱战歌”的诗集《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和长诗《淮上吟》等，1942年7月到重庆后参加到了“文协”的活动中，不仅出版了《泥土的歌》《国旗飘在鸦雀尖》《生命的秋天》等诗集，创作了《古树的花朵》《感情的野马》等在新诗现代性艺术建构中有重要影响的长诗，而且还创作了《“重庆人”》《裁判员》等收入诗集《宝贝儿》中的政治讽刺诗，既在现实的取材中喊出了诗人强烈的愤怒，又以“倾向于自然朴素与平易”^④的表现形式显现出臧克家在这一时期对诗歌的“朴素的美”的追求。

此外，流离到昆明的诗人们在西南大后方屏障的呵护下，仍然得以守着校园相对的宁静，除了受奥登、燕卜苏等人的艺术观念影响外，艾略特、里尔克、惠特曼、泰戈尔、高尔基、普希金、海涅、叶赛宁、雪莱、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人诗歌、艺术理论的译介，在校园里俨然已经从五四以来作为破旧立新的文学变革途径转变成为一种学习方式，不仅为中国革命现实主义诗歌艺术发展提供了滋育的养分，也使得新诗艺术在西南联大等校园之中，绽放出了娇妍的花朵。其中，身在昆明西南联大校园中的冯至在1940年冬至1941年秋创作的《十四行集》“在里尔克的影响下采用变体，利用十四行结构上的特点保持语调的自然”^⑤，对现代诗歌在艺术上的探索和诗学范式建构有着重大贡献，朱自清先生评价他“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使得向来怀疑这诗体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国的诗里活下去”^⑥。作为冯至、卞之琳、闻一多、李广田等诗人的学生的穆旦，浸润在诗学艺术氛围浓郁的象牙塔中，但又深深地忧虑着国统区社会现实和

① 艾青：《北方》，载艾青《艾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64页。

② 朱光灿：《中国现代诗歌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第735页。

③ 冯光廉、刘增人：《臧克家研究资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第23页。

④ 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第557页。

⑤ 冯至：《冯至选集·诗文自选琐记（一）》，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第14页。

⑥ 朱自清：《诗的形式》，载朱自清《新诗杂话》，三联书店，1984，第102页。